

教育：文化生态的龙头

胡弼成

(湖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2)

摘要：黄正泉教授在其《文化生态学》中提出了很多值得认真思考、且对当前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有着积极意义的命题。文化生态学是人类最高智慧，文化生态的转折根本在于人的“欲”与“理”能否制衡，在于传承人类思想和文化的教育作用的发挥。只有从文化生态的龙头——教育把好关，才能扭转当下人们错误的思想认识和价值观念，切实走出文化“最大腐败”的恶性循环。具体可从三方面展开：一是教育对象层面需把学生当作人；二是教育目标层面需培养学生成为他自己；三是教育实践层面把学校设计成人性养成的场所。

关键词：文化生态学；教育；教育对象；教育目标；教育实践

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2013(2015)05-0004-05

Education: Flagship of Cultural Ecology

HU Bi-cheng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2)

Abstract: Cultural ecology is the highest wisdom of mankind. The transition of cultural ecology lies fundamentally in the balance of humans' "desire" and "rationality", and in the role that education can play which inherits human ideology and culture. Only when we give a strict guard of education-the flagship of cultural ecology, can we reverse people's present false ideological understanding and concept of value, and walk away from the vicious circle of cultural corruption. This can be done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take the student as a whole person at the level of education subject, foster the student to be himself at the level of education target, design the school as the place to form humanity at the level of education practice.

Keywords: Cultural ecology; Education; Education subject; Education target; Educational practice

一般而言，生态的问题是生物、生存、生命的自然状态的东西，文化是人的境界的问题，人创造了文化，有了文化，才能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把文化与生态结合起来研究，可能就是人类最高的智慧之一。据研究，“文化”与“生态”两词虽然边界模糊，但最早渊源于人类学，富含人性的内容。可见，《文化生态学》是研究人类的最高学问——智慧之学，是人类智慧之学的顶峰。

文化生态学熔铸了人类的最高智慧。黄正泉教授在其《文化生态学》中提出了很多值得认真思考的命题。如“人是文化生态存在者”，“人是文化生

态学的逻辑起点”，“文化生态的运行之道：稳定、制衡和功能耦合等”，“反文化生态”，“强势文化生态的建设”等。这对当前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黄教授提出的“文化生态的生存-转换与转换-生存”，从生态学来看就是文化生态学研究的“文化生态链”。文化生态学其实是研究人所处的一切及其与文化的互动关系，其目的是解决各种文化及其与生态的关系，即解决人的可能生存问题。文化生态源于自然的平衡以及人与自然的制衡，是人类生存的智慧。智慧有大小之分。大智慧是人类从生态中吸取的通过文明生态使人最终走向生态文明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只有当文化本身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的时候，人们才能通过参照它来

收稿日期：2015 - 09 - 28

作者简介：胡弼成(1964—)，男，湖南长沙人，教授，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教育管理、教育经济研究。

理解文化生态。从动物与人类的连续性来看,如果人类历史只不过是一场为了生存而争斗的历史,只不过是一种有机的过程,那么,那些不断发生冲突的社会阶层就没有必要通过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来相互斗争了。正是由于人具有超越生物生理本性的属于人的特性,人拥有把这些意识形态结合到其中的各种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而且,这些意识形态之所以有效,完全是由于这种观念处于深深的植根状态,抓住了人。这种价值观和态度对人的生存起着关键的作用。人类的文化生态链就是在这里处于最有希望也最绝望的一环。

文化生态的转折靠什么呢?是人的“欲”与“理”能否制衡,是人类文化与反文化的律动。人之“欲”比天高,是无法穷尽的,但必须受到“理”的制约。“理”可能就是一种对“欲”的适当满足。“欲”和“理”是完全可以统一起来的。目前的文化生态是有毛病了,如环境的污染、文化生态的不健全、人的欲望的一种偏激等,很多方面都存在问题。最大的毛病在哪里呢?人已经被异化了,被异化成物欲的奴隶。近一百多年来,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人类欲望的激发,使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尤其是文化环境)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自然在频繁地报复人类,人类在无奈之中叹息、呻吟,呼唤着文化家园的重建。总之,人类的文化与反文化在于“理”与“欲”的相互制衡,而这正是人类精神发展以及个体价值观和态度的转折点。

在对人的精神发展研究中,黑格尔把人类精神的发展分为两个过程——人类精神的系统发生史和个体发生史。精神个体的发生是系统发生的重演,而这种“精神重演律”是借助教育来进行的^[1]。事实上,文化的构成主要有两大部分:一种是人们从历史中传承的传统思想,没有传统、缺少传承,人类文化就无以积淀;另一种则是与之相关的价值观念、态度,价值观与态度是文化发展的轴心。这两部分最终都归于教育,是教育在传承人类思想和文化,是教育在统摄作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中间变量的价值观与态度。因此,教育是文化生态的龙头。抓住了教育这个文化生态的龙头,就抓住了文化发展的“牛鼻子”。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需要一定的条件。文化生态学的产生和发展同样有一定的条件。文化生态学的产生和存在,可能与如下方面相关联:与文化本身出现了问题这个社会事实联系在一起;与一门使生态过程的研究成为科学对象的事实联系在一起;与某种特殊的方法和一种新的、对于种种文化形成过程的价值取向的发生联系在一起。而多样性的文化形成过程在意识形态中得到了科学的表现,其开放性保持了整个文化生态的持续稳定。这些条件促使中国自己的文化生态学的产生,也催生了包括黄正泉教授《文化生态学》在内的各种学术思想的萌发与成熟。

文化是为人服务的,且以各种模式为人服务。“文化的种种模式——宗教的、哲学的、美学的、科学的和意识形态的模式都是一些‘程序’;它们为社会的和心理过程的组织化提供模板或蓝图,就像遗传机制为有机体过程的组织化提供了这样的模板一样。”^[2]我认为,教育也是文化为人服务的模式之一。教育不同于其他事物,从文化生态学来看,教育是一种化人的模式,是人类为了生存得更好而创造的一种人性的文化。有人提出“教育是人类加速自身建构与改造的实践活动”,是有一定道理的。从根本上说,教育是人类社会遗传的优化途径。古代斯巴达人的婴儿呱呱落地时,就被抱到长老那里去接受检查。如果长老认为他不健康,他就要被抛到荒山野外的弃婴场去,这是从生物学和身体上优化种族。现代人类不可能停留于那一层面,而必须将不适的人类遗传因素和密码改良,这就得依靠教育这几千年来一直行之有效的模式。学校作为人类为自己设计出来的优化“遗传密码”的特殊场所,具有很强的文化性,是一类文化机构。因此,学校是不能缺少文化的。

事实上,现代教育种种“文化缺失”现象衍生:教育偏离“对人全面发展的培养”的本质,从人才的选拔到学校的设计都过度迎合市场的需求;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对立矛盾一再滋生;幼师凶狠体罚孩子所体现的师德“红线”严重超标;家长责难教师育人不足;“学术造假”日趋频繁;留学生不愿回国效力;人们的求学仅仅是出于某种功利的目

的而非内在灵魂的提升……教育的发展似乎走向一个“死胡同”。人们看不到教育对人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教育对人的影响是无用的,因为它让人们脱离理想,丧失人性以外的东西,让人们的心变得麻木,意志消沉,让人们身体变得虚弱、个性变得沉闷,置身于现实生活之外,让人们陷入贫穷、陷入现实生活的困境之中。教育有用吗?教育似一无可用。教育如何发展下去?人们又如何改变其根深蒂固的对教育的单一认识?越来越多的社会贤达以及学者开始认识到教育是一种文化,以及因为对教育文化品性的忽视引起了与教育相关的负面影响。因此,教育作为一种文化及其文化品性对教育的发展所起的影响已成为学界不容忽视的论题,对教育的文化意蕴、文化属性的研究亦逐渐成为社会共同关注的研究领域。北京大学哲学教授章启群认为:中国教育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教育失败的深层原因在于它违背教育的基本规律。教育的基本规律应该服从“人才成长律”、“教育律”和“文化律”,而不是“政治律”、“经济律”或其它。

当下,中国政府花大力气惩治腐败,可谓大快人心,但这主要在经济领域。从文化生态学来看,最大的腐败并不在这方面,最大的腐败是人的认识的偏颇,是人的价值观念出了问题,是人的思维出了错误。这就是人们认识事物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是人们把一事物看作另一事物——指鹿为马。这是逻辑的错误,是错误的根源,是文化的核心出了问题,是人类误入了反文化与不文明的方向。

从文化生态的龙头——教育——把好关,才能切实地走出文化“最大腐败”的恶性循环。具体可从以下三个层面展开:

第一,在教育对象层面需把学生当作人。从理论上说,很多教育学著作都承认、且明确地写着:“学生是人”。例如具有代表性、传播很广的《教育学》在“教育过程中的学生”中说:“学生是人”(是一个能动体,是具有思想感情的个体,具有独特的创造价值)、“学生是发展中的人”(具有与成人不同的身心特点,具有发展的潜在可能,具有获得成人教育关怀的需要)、“学生是一个完整的人”、“学

生是以学习为主要任务的人”(学生以学习为主要任务,学生在老师指导下学习,学生所参加的是一种规范化的学习)^[3]。类似这样的教材或理论都认识到“学生是人”,但并未深入地了解“人是什么”的问题,更没有在实践中贯彻“人性是什么”的道理。因此,在教育实践与教育活动中出现了很多不正常的现象:有的是反人性化的,出现了驯化的教育;有的是非人性化的,导致了物化的教育;有的是弱人性化的,产生了异化的教育^[4];有的甚至是反人性的,把人不当人看待。如把人主要按年龄分成一个个不同的班级来进行教育,就是把人当物来“铸造”。夸美纽斯将自己的这一创造比之于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可以“批量生产”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大量人才。人性化的教育要求从有利于人性自然生长的角度,创造促进学生生命自由成长和自主发展的教育形式和条件。从根本上说,教育应是以个体为单位来进行的。孔子的“因材施教”中的“材”就是指“个体的”,而非集体的。因此,需要把学生当作人,当作一个个的个体的人。

第二,在教育目标层面需培养学生成为他自己。既然学生是人,那么,学生的事情要靠自己来做主。在人的发展中,人的主体性是根本。主体性是指人的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主体性发展有一个历程,但个体的主体性与类的主体性发展遵循不同的规律与发展轨迹。培养学生成为他自己,更多地是遵从个体主体性发展的规律。“社会的劳动者”和“未来的接班人”偏重社会的要求,需要更多地依照类主体性发展理论培养人才。因此,“把学生培养成社会的接班人”这种工具论,在教育领域越来越成为阻滞人才培养的口号。“To be what one wants to be”、“成为你自己”、培养“走向世界的XX人”等,从文化多样化的角度看是人才培养目标的设计趋势。而且,价值观和态度而不是智力在人的主体性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对价值的看法、对事物的取舍、对人生的态度,决定了“一个人将成为什么样的人”。因此,有关义利观、理欲观和文明观的教育,都应设计为课程的主要内容。反观现实,大学现在存在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即提供给大学生的课程缺少哲学,缺少哲理性的内容,

所以把大学生培养成了只会赚钱的机器，没有“把人培养成为人”。我觉得这是学校现在的最大问题，大学课程缺少对人发展的智慧的设计，是对未来不负责任。目前文化的病态很大程度上就是学校尤其是大学造成的。大学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没有提供给大学生所需要的文化哲学，没有提供文化智慧，没有哲学的氛围，没有智慧的内涵，致使人们(包括大学生)都不喜欢哲学。哲学是什么？哲学是一种“空”，而现在提供的东西都是一种很实的东西，很实的东西不要靠教育，而靠“灌注”和“填塞”。它会造成大学生“倒胃口”，对未来的前途感到很渺茫，对社会的适应性不宽，没有弹性。现在学校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很多不是社会所真正需要的，以赢利为目的的企业也不需要这样的人。这就是学校在设计教育目标和课程的时候，只顾眼前利益，不能放眼长远的后果。大学现在太实际、太实用主义化了，需要搞一些“空”的东西。如果试图通过哲学提供实际的信息，那哲学(书)就是一堆废纸。哲学肯定不是提供一些实际有用的信息，《文化生态学》是站在哲学的高度提供了一种思想智慧。

学校为什么没有提供给学生智慧的课程？这不仅仅是学校里的事情，更暴露出社会的反文化现象。在人们的生活实际中，“快餐文化”、“病态文化”、“文化异化”频现。我觉得这种文化是很不好的一种文化生态，是一种反文化的文化生态。当然，这种病态的文化生态不是现在才有，过去就已经存在，像龚自珍那时候就提出来了。他写的《病梅馆记》认为：以天梅、病梅为业，以求钱也。文人画士把梅画得曲曲折折，画得那个样子，以为是美的，以曲为美，所以江浙之梅皆病。文人画士之祸之烈至此哉！什么人造成的，都是文人画士，都是知识分子造成的。现在很多人也是为了求钱、为了把这个位置能够坐稳坐下去，满足他的权力欲望，所以出现了好多这样的文化病态。黄教授的《文化生态学》对文化的病态进行了批判，他归结到人的问题，是文人、知识分子缺少人文关怀，缺少文人风骨，缺少知识分子的精神。黄教授的思维是一种哲学思维，哲学思维是一种批判性思维，这部书是很深刻的。

第三，在教育实践层面把学校设计成人性养成

的场所。关于这一层面要回到“人性是什么的问题”和“教育是什么的问题”。关于人性，人本心理学者认为人有潜能、人有价值，人性发展有一个方向，他坚持向着愈来愈完美的存在前进，向着安详、仁慈、英勇、热爱、无私、善行、文明前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性的研究必须从现实的人出发，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类本性是不断完善的，最终会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在那里人是自然和自己的主宰者。在上述人性假设的基础上，教育的本质就是发挥人的潜能，发现人的价值，通过文化的传递、内化、融合和创新使个体社会化，其本质属性在于引导完备人性的建构与发展。因此，办学中要把学校设计成启迪人性的场所。

首先，学校不能办成呼唤物欲的场所。商场以赢利为目的，学校不是“物—物”、“钱—物”交换的商场。学校之所以受到如此责难，是因为学校没有设计成精神成长的殿堂，学校的功能受到了极大挑战。国内外所谓的“影子教育”即“补救教育”，就是为了弥补学校教育之不足而发展起来的以赢利为目的的校外教育。这种教育如果引导不当，会走向人性的反面。俗话说：要做事，先做人。事实上，做事与为人要同时在学校获得培养，相得益彰地体现在一个人身上，这是学校的功能所在。这样，一个人才能做出对社会有贡献的事，成为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民的人。

其次，学校不能办成欲望横流的场所。现代所谓生态危机是人的欲望带来的，欲望是生态危机的根源，这实际上是对人的否定。人是有欲望的，也不能没有欲望，但学校应处理好“欲”与“理”的关系。“存天理灭人欲”是朱熹理学思想的观点之一，后人多把它作为宋明理学禁锢人心自由的证据。其实，“存天理，灭人欲”的命题早在《礼记·乐记》中就已经出现了。“存天理”在朱熹的眼里，是对天理、善念的追寻，而“灭人欲”是指克己省身，修身养性。这句话非但不是对人性的禁锢，反而是要求保护人性，追寻本心，克制人过度的欲望。因此，学校应通过理性的培养，使“理”与“欲”在一个人身上达到制衡的状态。

其三，在决策与制度设计上要有利于人性不断

地走向完善。人天生的各种欲望,以及趋利避害、好逸恶劳的本性,就是礼的起源,也是制定礼义、法度的基础。“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既然人类对社会物质财富和自然资源的不断索取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那么,在有限的资源面前,人类为满足自己的欲望(尤其是贪欲)必然会发生争执、争夺甚至战争。“圣人积思虑,习伪故,以生礼义而起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荀子·性恶》)。为了有效遏制、限制、禁止人们随心所欲的行为,作为统治者,必须用权势来统治他们,用礼仪来整饬他们,用法律来制约他们;请教师来教育、引导他们,想方设法开启他们的心志,向他们灌输美好崇高的思想道德品质和科学文化知识,通过有效的措施和途径,将他们的心志纳入善道。这个有效措施和途径就是道德良心、师法礼义、刑法制度。所以,在学校的创立和办学活动中,在教育决策、制度维护与设计过程中,管理者需要强化其自我道德、良心意识和人性的决策与制度,尤其在决策和制度实施过程中需要强调自我责任意识。领导者是一般管理者和工作人员的领头人,在政策制定和制度设计上起着关键的作用。其言行应该表率群众。

他们在制定政策和完善法规过程中应尽量“将心比心”,多考虑一般群众和全局的利益,将公正观念和民主意识贯彻于国家和学校等的有关管理中,自己做不到的决不要求他人去完成。而且,应完善教育监督体制,对教育过程建立自下而上的监督机制。

总之,教育作为文化生态的龙头须努力让每个个体立稳脚跟。在“百年树人”的长期、长效过程中,个体内心持守的信念和法则,必须与法律等其他社会规范、制度密切配合,更需要文明社会中的个体人格的完善。外在的法律规范约束越是严格,内在的尊严和道德自律就越会崇高。人就是在这种内心持守与外在约束密切关联、相互促进中自立、自理、自律地成长的,藉此文化生态才能得以繁衍生息、绵延不绝。黄正泉教授的《文化生态学》就是让每个个体立稳脚跟之书,可以肯定地说,《文化生态学》思想将会繁衍生息、绵延不绝!

参考文献:

- [1]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8.
- [2] 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216-218.
- [3]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127-131.
- [4] 张中原,扈中平.教育人性化的三重遮蔽与敞明[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5(2):1-9.

责任编辑:曾凡盛